



第一章

导论

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①

——荀子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总和，是在调和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②

——全球治理委员会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本书缘起于笔者对媒介发展的现实观察。

^① 语出《荀子·君道》。在纵横对比中彰显我国民主治理的优越性[EB/OL]. (2021-09-23) [2024-06-24]. https://www.cssn.cn/mkszy/mkszy_pyxsd/202209/t20220913_5494558.shtml.

^② 出自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张国庆. 公共行政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97.



对于一个学者或者笃志成为一名学者的学生而言,其学术研究往往生发于其生命的肌理中,与其在寻常生活中的所见和所思紧密相连。本书就缘起于这样一些寻常生活中的所见。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①,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发展方向。同年9月20日至21日,中宣部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确定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到2020年秋,笔者参与了一个有关县级融媒体改革的研究课题,发现在这两年多时间扬名全国的浙江长兴、江西分宜、四川富顺、浙江海宁、甘肃玉门等多个优秀的县级融媒体发展案例中,“媒体+政务”均逐渐成为其融合发展的主要功能定位之一。以浙江海宁县级融媒体中心重点打造的客户端App“大潮网”为例,该客户端集成新闻资讯、网络电视、社交娱乐、生活服务等多种功能,在当地民众中广受关注。而在“大潮网”的页面上,当地政务部门多已开设端口,极大地方便了当地民众“办事”或与政务部门的沟通。为了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依托“大潮网”与公众联结,海宁融媒体中心还派遣工作人员对他们开展相关的培训。这样,海宁的电子政务不仅实现了平台化,而且可以直接与当地的媒体机构进行关联。作为海宁主流媒体的海宁融媒体中心,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了海宁当地的政务工作。

另外,2018年7月,笔者读博期间与同学一起在浙江省缙云县进行乡村传播情况调研。当我们结束调研回到农家乐的傍晚,刚好听到店门口的大喇叭在播报我们在当地调研的新闻,此后几天,每当访谈时向村民介绍我们的来意,他们都会笑盈盈地说知道我们,“早就从广播里听说一个本地的大教授带了很多大学生来做学问”^②,我们问他们是不是天天听广播,他们说多年来

^① 张丽萍.加快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EB/OL].(2019-02-19).<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219/c40606-30804054.html>.

^② 摘自2018年7月13日对缙云县周村农民的访谈记录。

早就养成这习惯了,“早上听着广播起床,傍晚做完农活听着广播回家”。^①当地媒体与农民生活关联之密切着实让我们感叹。而且,当我们问起我们来调研的消息怎样被广播记者获知,方知这是由于村中有很多“网格员”,他们每天在自己分管的地方巡行八九个小时,如果发现哪家有什么新闻——有时只是很小的“新闻”,比如谁家来了“贵客”等——都会第一时间录入其内部的系统,据此他们还能获取每条10~15元的报酬。后来,我们通过对一名网格员的访谈了解到,他们报送的信息不仅通过浙江省的电子政务系统可直接被县、市、省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浏览,因此可以有效地排查当地的风险因素,从而有利于基层治理,而且成为当地媒体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浙江缙云,笔者第一次关注到媒介与基层治理之间的紧密关联。

通过这两件事以及与之类似的见闻,笔者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那么,中国如此,世界何如?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笔者在加拿大访问学习。因为行前已经耳闻加拿大社区报发展之成功,观察加拿大社区报和其基层社会的发展情况就成为笔者此行的目的之一。在此期间,笔者形成了两种主观感受:一方面,当地社区报的发展态势确实值得称赞,不仅纸质报纸随处可见,而且已经发展为成熟的融媒体形态——网页、电子报、新闻信、社交媒体账号等内容都十分丰富,当地居民的点击率和评论率都很高;另一方面,当地社区的秩序也为人称道,不仅犯罪率较低^②,而且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场所利用率极高,已成为当地民众休闲娱乐时常去的场所。综合这两方面的观察,笔者不禁感慨加拿大社区舆论生态的蓬勃和基层社会的有序,也忍不住发问:社区报等地方媒体与其社会秩序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媒介是否能够成为基层治理的一股有生力量?

在对媒介的观察之外,本书也缘起于笔者对有关治理的政策动向的思考。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治理”一词开始广泛出现于各种政令、文件中,并成为学术研究的高

^① 摘自2018年7月20日对缙云县周村农民的访谈记录。

^②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 加拿大各省犯罪率统计(2018)[EB/OL]. <http://www150.statcan.gc.ca/n1/pub/71-607-x/71-607-x2018008-eng.htm>.



频词。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例,“治理”在其中的使用频次位列所有高频词的第10位,而与其一同被高频使用的热词多为“制度”“体系”“社会”“人民”等官方文件的惯用词。这对于一个在官方文件中出现不过10余年的词汇而言不可谓之寻常。同时,学术研究领域对“治理”一词的应用也十分频繁,截至2024年8月13日,在中国知网以“治理”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到1 075 222篇学术文献。由此可见,“治理”一词已经成为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然而,通观这些政令、文件和学术文章中对“治理”一词的使用,不难发现由于“治理”一词的多义性,当前很多文章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应用都有些模糊。一方面,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治理”一词被定义为“统治;管理”和“处理;整修”,因此当用在有关社会管理的语境下时,“治理”很明显地就指向了具有“治国理政”意味的社会管理方式,其主体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如封建社会的君主,以及当前环境下的政党、政府等);而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研究的发展,“治理”的定义又逐渐凝聚成由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如任剑涛在《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一文中所言:“这一模式旨在将国家权力、企业组织与社会组织多方面的治理动能激发出来,因此是多元的治理;同时,这一治理模式尝试将国家权力统治改变为国家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因此是更为民主的治理模式。”^①也就是说,随着西方政治学、管理学等研究的发展,当前学术文本和政策话语中对治理的表述越发带有明显的多元治理意味。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当前中国的治理也在经历多元主体的转向。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公众参与”“社会力量参与”“企业职工参与”“自治”等有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语段多次出现。尤其有关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表述更是直接强调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① 任剑涛.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J]. 行政论坛,2021,28(2): 2,5-18.

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①,昭示着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具有更新的时代内涵。

基层治理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决定着国家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也对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③,强调“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基层官兵等均可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基层治理的方式也更加多样,网格化治理和“小巷总理”“下沉干部”等新词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基层治理手段的不断丰富。在这股基层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时代浪潮中,有两个趋势特别值得关注。一方面,人的作用更加凸显,网格员、基层官兵等个体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较以往更为基础和关键,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日益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更加完善;而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迭代,媒介融合走向深化,媒介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甚至正在重塑人们思考的底层逻辑。对于前者,很多采纳传播政治经济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9-11-05)[2021-05-0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422.htm.

② 让基层社会治理深植实践温暖人心[EB/OL]. (2019-03-28)[2024-06-24]. <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n1/2019/0328/c117092-31000313.html>.

③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EB/OL]. (2020-09-18)[2024-06-24].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918/c40531-31866045.html>.

④ 加强新时代军队基层建设的根本遵循[EB/OL]. (2019-11-22)[2024-06-24]. http://www.81.cn/xxqj_207719/xxqj_207747/9680691.html.



学视角的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探索,而引起笔者兴趣的是,随着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发挥的影响越发凸显,在基层治理这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下,媒介所发挥的作用是否也日益凸显,并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异于从前?是否有一些基层治理的难题缘起于媒介迭代的历史过渡阶段,同时,是否有一些基层治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可以通过媒介化的方法解决?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媒介与基层之关联的研究已有很多。

一方面,自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起,基层社会的秩序就被视为与社区融入关联紧密的一个概念。例如,社会无序是R. E. 帕克(R. E. Park)等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他们发现社区凝聚力(这一概念日后逐渐被与“社区融入”相关联)的下降会导致社会失序:

随着大城市的日益增多,机器工业带来的广泛分工,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多样化而来的运动和变革,以家庭、邻里、本地社区为代表的旧式的社会控制被破坏了,它们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

这个早期控制社会的文化制度,其权威和影响的削弱以致被破坏的过程,汤马斯称之为个性化过程。他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观察的。但如果从社会和社区的观点去观察的话,那么这就是社会的解体。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个性化和社会解体的时代里。一切事物都处于动荡的状态中——一切事物似乎都在进行变革。社会显然只不过是由一些像星座似的社会原子所组成的结构。习惯只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即使这种稳定性,只不过表现为事物在变革中的相对经常的形式而已。因为事实上,既然宇宙中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所谓相对稳定性就只能是这样……每次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常规的新发明,都会在同等范围内产生瓦解性的影响。每一项新发现、新发明、新思潮都会引起动荡,甚至某种新闻也常常会变得危险,以致政府认为禁止这种新闻的发布是明智的。^①

^① 帕克,伯吉斯,麦肯齐.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 宋俊岭,郑也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8.

而社区融入这一概念在之后的研究中也与地方媒体的使用紧密地关联起来。20世纪90年代,杰克·迈克里德(Jack McLeod)等学者针对媒体使用与社区融入的关联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其结果指向当地居民的社区融入情况和其当地媒体接触行为的明显正相关关系。^①迈克里德之后,关于媒体与社区融入的研究依然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虽然很多学者对于二者谁为因、谁为果常常各执一端,但多数学者赞同媒体使用与社区融入具有关联这一观点。^②近年来,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增添了新技术的视角。如有学者对当地多种平台信息的使用如何影响社区参与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四个变量——信息搜索习惯、对社区的兴趣、对技术的获取方式,以及对当地信息的了解彼此影响,同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居民的社区融入倾向也将提升。梳理这些研究的逻辑脉络,可发现地方媒体被视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等具有一定意义。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认为媒体使用会提高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如潘忠党认为互联网使用会明显影响公民获取时政知识、参与意见表达、参与社群组织及其活动^③;李丹峰通过对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中普通居民问卷数据的分析,提出人们对地方媒体及地方政府的信任对村/居委会投票行为有显著影响。^④而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将公众对基层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视为基层善治的指标之一。如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Richard C. Box)在谈到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时提出,民主原则应被视为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能否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获得‘最好的’结果,取决于公民是否获得信息,并能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自由而公开的讨论,而不是依赖于精英集团的偏好或者局限于选任代议者的审慎决断。这一原则

① MCLEOD J M, DAILY K, GUO Z, et 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loc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 23(2): 179-209.

② MAHRT M. Conversations about local media and their role in community integration[J]. Communications, 2008(33): 233-246.

③ 潘忠党. 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 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普遍性[J]. 新闻大学, 2012(6): 42-53.

④ 李丹峰. 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基层投票行为——以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为例[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1): 41-51.



寄托了人们道德的或伦理的期待,即在社区生活中应赋予公民拥有更多选择和决定其社区未来的机会”^①;俞可平认为,“善治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②;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善治过程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③ 这些来自传播学和其他多个学科的研究为媒介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联理出了另外一条思路,即媒介使用会提升公众的公共事务参与,而公共事务参与可以促进基层治理效果的提升。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思路,可发现将基层治理与媒介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可行性,但是,如果将视野从理论研究拉回到现实世界,很快就能发现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近几年的媒介环境与此前研究文献中的论述已然迥别。一方面,随着媒介环境的不断演变,传统媒体阵地渐失,报业进入“寒冬”,而各种类型的自媒体、公民新闻则纷纷产生,不断争夺着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媒体影响力的逐渐上升,获取信息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人们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由主动接触逐渐变为被动沉浸。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舆论生态的失衡使得包含基层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各个层面中的不可控因素增多,风险社会逐渐来临。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所持的观点,风险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工业社会的资源短缺和资源分配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因此,整个国家制度设计、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已经不再是以资源分配为逻辑展开制度设计和话语交流,而是以如何分配风险而展开的妥协趋同。^④ 在这种语境下,媒体可能成为风险的放大器,也可能成为稳压器,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路径,我们需要去探索各种各样的思路。对此,近10年间,不同学科的学者对风险社会、风险治理、基层治理等进行了许多探索,而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留待本书探索的议题是

① 博克斯. 公民治理: 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 孙柏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4.

②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7.

③ 刘功润. 作为共同体的城市社区自治问题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28.

④ 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媒介如何参与基层治理。

在这一方面,郑亮的《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为本书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在该书中,作者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治理都置于技术更新迭代的大背景下,分析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技术赋能下助力基层治理的表现。^① 该书的创新之处是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并列进行分析,这一做法为本书提供了行文思路方面的启发。另外,近年来对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媒介化社会的研究为本选题的确定提供了启发。童兵认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重逻辑: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的结果是提供了媒介化社会的技术推动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受众对于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是媒介化社会的必要性前提;而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恰恰展示了媒体的巨大影响力。”^② 概言之,媒介化社会的视角不仅强调了媒介与社会互构关系的强化,而且也强调了媒介在影响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所具有的“行动者”属性。^③ 在这一领域,近年来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闫文捷、潘忠党等在“媒介化”理论视角的框架内通过内容分析、访谈和对节目案例的分析,对比了“监督类”和“议政类”两种类型的电视问政节目的社会治理功能,并结合“媒介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定形式与实践就媒介化治理的意义和限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讨论^④;沙垚在其文章中提出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认为该“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和操作,所谓媒介化治理便是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将媒介前端的精神落地,成为后端的实践。^⑤

综上,面对各学科对当前形势下媒介与基层治理之关联的多元思考,传播学领域内的相关讨论为本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在前人对媒介与基

① 郑亮. 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7.

② 童兵. 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构建[M]. 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

③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1):37-56,126-127.

④ 沙垚. 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19(9):112-117.



层治理的关联和对媒介化治理的有关讨论的基础上,本书将试图探讨以下议题: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媒介如何参与改良甚至重构基层,使基层既能保持有序的社会互动,又能与主流价值观更好地接合,使其舆论生态既是良性可控的,又是互联网时代可以蓬勃开展的?

具体而言,本书意欲探索的研究问题可分为“案例研究”“功能探析”与“路径探索”三个方面。

(1) 案例研究方面: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形成了哪些有代表性的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生发于什么样的媒介环境,又有什么特点?它们凸显出媒介化方法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哪些功能?当前已有的实践又有哪些不足?

(2) 功能探析方面:上述实践中凸显的媒介化方法在基层治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为何得以发挥?其中的逻辑和机理是什么?

(3) 路径探索方面:伴随媒体深度融合的推进,如何探索下一阶段基层治理的媒介化方法?具体而言,如何将媒介化基层治理工作分层次、分步骤地梳理清楚,进而从各个层面、流程的各个环节有序推进基于媒介化方法的基层治理?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成果

为了更清晰地展开讨论,本书首先对相关概念予以廓清。

“媒介”是本书需要界定的第一个关键概念。由于在传播学科内外被广泛应用,“媒介”呈现出一定的多义性。在传播学之外,其常被用以指代引起化学反应、病毒传播等的介质;在传播学之内,其有时被与“媒体”的概念混

用,用以指代具体的传播机构,有时也被作为一个学术议题专门讨论,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在本书的语境下,“媒介”的含义回到传播学讨论的原点,本书用其指代信息传播的承载物或介质。正是在这一层含义上,媒介的概念与媒介融合、媒介化社会等进行了结合,导向了本书所关注的媒介化基层治理的议题。

尽管更早的时候有学者将媒介融合与“计算机和通信系统融合”、计算机工作和出版印刷业与广播电影工业的融合等关联起来,但目前学界公认的最早提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伊契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他于1983年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一种网络与媒介设备的融合趋势,即:

一种单一的物理手段——无论它是电线、同轴电缆或广播电视的无线广播——就可以承担过去需要几种方式才能分别提供的服务内容。相反,过去由任何一种媒介——不管这种媒介是广播电视、报纸或是电话——提供的服务,现在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物理手段来提供。^①

之后,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涉及媒介融合基本概念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如托马斯·鲍德温(Thomas Baldwin)等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罗杰·菲德勒(Roger Fidler)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凯文·曼尼(Kevin Maney)的《大媒体潮》、约瑟夫·斯特劳巴哈(Joseph Straubhaar)等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等。这些著作均预言了媒体融合的趋势,并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较早的界定。不过,虽然“媒介融合”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出现,但对它的定义却仍未形成定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对它的把握往往与媒介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实践紧密相关,纵向的时间维度导致了对这一概念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西方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主要有媒介史、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视角,不同的研究视角导致了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

对于本书而言,“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种时代背景,在这个时

^① 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杜永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0.



代背景下,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不断发展正在重构着人们的生活,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让“地球村”的感觉更加强烈,也推动着人们对“本地”的重新认识,媒介与社会的互构作用增强,人们已经越发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

从时代背景的意义理解媒介融合,就需要将之与“媒介化”这一概念进行联系。“媒介化”是指随着媒介的发展——尤其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媒介对人们生活的渗透性空前加强,媒介逻辑对人们的社会建构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趋势。早期,“媒介化”主要被用于指涉媒介对政治传播的影响。瑞典媒介学者肯特·阿斯普(Kent Asp)最早提出了政治生活媒介化的概念,认为政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播对政治报道的影响,而且自我调节以适应大众传媒的需要。^①与阿斯普相似,马佐莱尼(Mazzoleni)和舒尔茨(Schultz)将媒介化的概念用以分析媒介对政治的影响,提出了“媒介化政治”的概念,即政治失去自主性,其核心功能逐渐依赖于大众媒介,并依靠与大众媒介的互动而形塑。^②在他们之后,弗里德里希·克罗兹(Friedrich Krotz)在网络媒体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应该把媒介化视为一个与个体化和全球化并列的“元进程”,并将其定义为“一个历史性、不间断的、长期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媒介出现并得以制度化”。^③以这些讨论为基础,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在其《文化与社会媒介化》中进一步提出,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使人们对文化与社会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及其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一方面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成为社会制度。^④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基层治理的媒介化方法”是一个具有政治学和管理学意味的研究领域,所以媒介化研究中很多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思考对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① 夏瓦. 文化与社会媒介化[M]. 刘君,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13.

② MAZZOLENI G, SCHULTZ W.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3): 247-261.

③ KROTZ F.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M]// LAUNDBY K.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 consequenc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21-40.

④ 夏瓦. 文化与社会媒介化[M]. 刘君,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1.

二、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成果

（一）“基层”的概念及有关基层的研究

基层社会是一个常用但却宽泛的概念。正因如此,学者们往往对其的定义莫衷一是。整体来看,学界对“基层”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从社会阶层生活空间的角度定义基层,如有学者认为基层是“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共同空间”,它不只是社会中下阶层群体所处的位置,也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其生活中所共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是社会成员共同接触到的组织和社会制度^①;第二种是对“基层”的概念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分,广义的基层也被视为生活的空间或“生活圈”,而狭义的“基层”则应从地理范围的角度予以阐释,在这一视角下,基层社会被视为“‘乡村’与‘街道’等的简称”。^② 本书较为适用第二种定义,即综合考虑基层的“生活空间”意味和地理范围意义,将“基层社会”定义为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范围包括乡村、街道、社区等。不过,由于本书讨论的对象是通过媒介化方式推进基层社会的治理革新,所以有必要明确“基层媒体”这一概念的指向。虽然本书将基层的范围划定为乡村、街道、社区等低于市、县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但是因为城市社区媒体、县级融媒体等的信息传播范围均与基层社会趋于重合,所以,在本书的语境下,城市社区媒体、县级融媒体等均被定义为基层媒体。

本书对基层和基层社会的讨论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社区与村庄演变的视角下进行的。在这一方面,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探讨的“社区”与社会的区别、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讨论开启了本书对西方基层社会历史演变分析;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等基于人类生态学的方法对芝加哥市开展了大量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他们有关城市社区研究的观点和成

① 杨雪冬.把基层的空间还给基层[J].人民论坛,2010(24):4-5.

② 郑亮.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45.



果汇集于其《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①一书中,为本书参考和采纳其人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了解城市社区报的创办原因和背景等均十分有益;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探讨了西方工业城市崛起前的乡村生活,为本书思考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概念流变提供了参考。

有关“中国的基层”的讨论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差序格局、双重认同、礼治等中国乡村文化的讨论对本书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影响很大,而贺雪峰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对这些乡土中国文化特征所进行的继承性反思——尤其是对“半熟人社会”“社会关联”“社区记忆”“双重认同”变迁等的分析——也为本书分析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治理”“基层治理”的概念及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

“治理”是一个具有丰富意涵的概念。该词在中国的使用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就已将其用于治国、理政、平天下抱负的抒发。如《荀子·君道》记载:“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其学生韩非也提出“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的思想。可见至战国晚期,“治理”一词已具备“国家管理应按照某种规律、规则行事”之义。秦汉以后延续了战国国家管理形态的基本形式,“治理”一词也沿袭了其在战国时代的含义,普遍出现在文献中。^②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治理”来表述“治国理政”的含义,这一用法更多地指向居高位者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统治与管理。

不过,随着近年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演变,以及治理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当前国内学术场域中对“治理”的讨论慢慢添加了该词的西方意味,

① 原作为 *The City*, 本版译作改为现名。

② 卜宪群. 中国古代“治理”探义[J]. 政治学研究, 2018(3): 81-86.

其指向的是多元主体的治理这一特定的治理模式。在西方语境下,“治理”所对应的 governance 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牛津简明政治学词典》将其解释为:“明确地来自政府的集体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过程”,反映了对供给公共物品的规范和程序更广泛的关注。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在管理领域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对危机的管理,并确定了衡量治理的六个维度: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非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力、监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此后,公共管理领域、政治学领域对这一概念的关注和使用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治理理论反映了撒切尔夫人计划对国家角色的限制、推动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外包的强调,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治理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对监管框架、代理权限和非政府服务提供的服务这些传统上被议会政治忽略的领域,治理视角也被用以审视对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非政府网络,这种进路涉及公民社会、社区行动、社会资本、慈善和腐败等方面。^①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总和,是在调和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②

不过,尽管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即已形成了对“治理”概念较为通行的概念,不同学者对于治理的概念与内涵的理解有时仍会有不同的偏向,比如,美国学者詹姆斯·N. 罗西瑙(James N. Rosenau)通过对比“治理”与“统治”来阐释“治理”的概念,认为治理是指“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③ 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④ 在此基础上,R. 罗茨(R. Rhodes)从治理理念发展的角度切入,认为治理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

① 任剑涛.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J]. 行政论坛,2021,28(2): 2,5-18.

② 张国庆. 公共行政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97.

③ 罗西瑙. 没有政府的治理[M]. 张胜军,等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5.



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① 另外,J.库伊曼(J. Kooiman)和M.范·弗利埃特(M. van Vliet)从治理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阐释了这一概念,认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② 通过对“治理”的概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不同于过去的社会管理方式,而更加强调社会管理过程中“参与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③

以这些梳理为基础,可以发现当前西方学界和国内的国际政治学界对“治理”一词的使用较多地强调其多元主体治理的含义,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治理”的“治国理政”意味的强调,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差异性,在我国政策文本和学界讨论中对“治理”一词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在地化内涵”^④,因此,本书语境下对“治理”的定义综合考虑了该概念在政策文本和学术文献中的用法,将其定义为依靠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为,而当这些讨论涉及中国的社会治理时,其含义一定程度上对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予以强调,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以激活个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活力为方式的社会管理方式。^⑤

顺延以上对“基层社会”和“治理”的定义,本书语境下的“基层治理”是指对乡村、街道、社区等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所进行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依靠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所开展的社会管理活动。不过,因为“基层社会”的概念和“治理”的方式方法均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必要对本书语境下“基层治理”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详细区分。

① 罗茨. 新的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42-48.

②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③ 郑亮. 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 36.

④ 姬德强. 平台化治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J]. 新闻与写作,2021(4): 20-25.

⑤ 政策文本参照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03).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具体而言,本书语境下的“基层治理”包括以下两个维度的含义:首先,就治理的范围而言,本书中的“基层治理”包括乡村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两方面;其次,就治理的内容而言,本书中的“基层治理”包括常态化基层治理和风险基层治理两方面,分别对应社会融入、基层日常秩序的维持、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以及基层风险的防控等内容。

在对城乡治理的研究中,除前述芝加哥学派对西方社区治理的分析和费孝通、贺雪峰等对中国乡村社会特点的分析外,俞可平、周庆智等对中国基层社会善治、自治等的讨论也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其中,俞可平提出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①;周庆智将中国历史上的基层治理概括为集权制下的代理治理并对之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历时性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思考中国基层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均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在对常态化基层社会媒介化治理的分析中,本书一方面从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等理论中获得了东西方基层社会文化特征的参考;另一方面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等进行反思,在梳理和思考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公共关系研究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了媒介化基层治理的学理逻辑。

非常态的基层治理方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的研究,以及由卡斯帕森夫妇(Roger E. Kasperson & Jeanne X. Kasperson)最初提出、奥温·雷恩(Ortwin Renn)等继续完善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本书对社会风险的研究起源。具体到风险治理方面,国内学者王庆所著《环境风险的媒介建构与受众风险感知》,以及郭晓科等对大数据技术的风险防控功能的探讨也对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① 俞可平.走向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05.



三、有关媒介化方法的研究成果

“基层治理的媒介化方法”是“媒介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手段、方法方面的具体化。承前所述，“媒介化”的概念与“中介化”紧密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媒介逻辑介入社会建构的过程”。^① 由于不同形式的媒介具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建构功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媒介化社会”。^② 不过，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产生之前，媒介被视为只具有“中介性”意义，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人对世界的感知，因此这一阶段的社会还不能被冠以“媒介化社会”的名称。直到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等迅猛发展和媒介融合进程的全球推进，媒介才真正具有了“存在论意义”。^③

在“媒介化”和“媒介化社会”的视域下，媒介具有参与和影响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地位。^④ 因此，本书语境下的“媒介化方法”被界定为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理念和方法，这种理念和方法不仅更为强调媒介技术和逻辑在基层生活建构中的能动作用，而且将以基层民众为传播受众的基层媒介作为基层社会改良的实际工具。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郑亮基于中国县级媒体融合所具有的基层治理意义进行的探讨、潘忠党等对电视问政的媒介化治理效果的研究、沙垚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所进行的思考均对本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因为本书对基层媒介的讨论主要围绕县级融媒体和社区报这两类媒体进行，所以本书对这两类媒体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① COULDRY N, HEPP A.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3(23): 191-202.

② 洪长晖. 混合现代性：媒介化社会的传播图景[D]. 杭州：浙江大学，2013：14.

③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1)：37-56，126-127.

（一）有关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县级融媒体是在整合县一级新闻机构如县级广播电视、县级报、县级官方新闻网站等的基础上,经历组织机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等多方面融合改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县一级新闻单位。当下,有关县级融媒体的学术研究基本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1. 对县域媒体融合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等意义的探讨

如郑亮在《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认为,推进基层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打通农村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消弭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安全感,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都离不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参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将县域内的政务信息系统连接,使多个部门的职能融合发展,最终构建综合性的政务服务体系。^① 陆地和高宝霖认为,建立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对于我国社会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电视能够削弱媒体过度商业化产生的弊端,并给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提供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② 张志华认为我国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构城乡互哺的传播关系的关键内核。基层媒体是应对传播领域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途径,应该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东风,恢复“通讯员制度”,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等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农民的参与性,将农村多样、生动的故事上行,平衡城乡之间单向交流的“赤字”,促进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③

2.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典案例的分析

如由富顺县融媒体中心一线采编人员编写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案例——四川省富顺县实践》一书,从融合实践、服务实践、发声实践和技术驱动四个角度切入,以富顺县媒体融合改革过程中的32个小“切面”为案例,翔

① 郑亮. 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20: 87-95.

② 陆地, 高宝霖.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公共广播电视? 之二[J]. 声屏世界, 2005(8): 18-20.

③ 张志华.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亟须上行乡村故事[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1-10(3).



实而深入地介绍了县域融媒体改革的富顺案例,为学界和业界了解富顺融媒体中心改革提供了全面而鲜活的材料。^①或如张磊和张英培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邳州经验》从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江苏徐州的邳州县级融媒体中心“银杏融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如何重建传播生态、打造融媒精品、引导社会治理。该文发现,“银杏融媒”作为社会治理中介,借助新兴的智能化媒体技术,在战略部署和日常运作中充分发挥了传媒的组织功能,对重建官方舆论场、开拓民意渠道、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起到了良性作用。^②

3. 对县域媒体融合的价值、意义、实践路径等宏观议题的探讨

如谢新洲等著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背景、意义、价值、目标定位、架构和功能设计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③,郭全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认为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省级技术平台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少进展,并探索出了若干种模式,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顶层设计、理念、定位、人才、技术平台、体制机制、融合路径等方面的难题,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导下,转型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新平台。^④

(二) 有关社区报的研究成果

社区报是指以当地社区民众为目标读者的报纸。相比大规模发行的、以服务较大地理空间内的读者为目的的日报等大型报纸,社区报表现出突出的近地性特征。在与大型报纸做比较的语境下,社区报与当地报纸(local newspaper)的概念常被混用,在有关商业利益、发行数据等的讨论中,社区报也常被冠以小市场报纸(small-market newspaper)的称谓。

① 高仁斌. 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案例——四川省富顺县实践[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② 张磊, 张英培.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邳州经验[J]. 新闻与写作, 2019(7): 99-102.

③ 谢新洲, 等.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

④ 郭全中.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进展、难点与对策[J]. 新闻爱好者, 2019(7): 14-19.

1. 有关中国城市社区报的研究成果

国内对社区报的研究肇始于2003年。是年,新闻传播业界出身的冯军、朱海松出版《终端渗透——传播从社区开始》,对社区媒体、社区营销、社区文化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通过对社区媒体的运营,可以将商业客户的品牌文化和住宅小区的社区文化有效糅合,构筑一种全新的社区经济模式,从而为小区住户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居住形态”的理念,这一具有明显商业性质的专著开启了我国的社区报的研究。2005年,张咏华的《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通过介绍美国有关社区与传播研究项目,提出在我国高度重视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需要对传播与社区归属感进行研究^①;陈凯的《走进美国社区报》一书通过实地采访美国多家社区报,对美国社区报纸的报道、发行特点等进行了深入描摹,为社区报纸的理论和实务研究提供了很多鲜活的素材^②;曾兴《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一书对社区、社区媒体、社区媒体研究的理论范式、各种社区媒体形式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梳理。^③2013年后,随着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文化软实力、加大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等,关于我国社区报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多,常见的研究取向包括对特定社区报办报经验、运营模式等的探讨,对我国社区报发展历程的历时性分析等。

2. 有关加拿大社区报的研究成果

因为加拿大社区报的发展历史较长等原因,有关加拿大社区报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材料相对较多。关于加拿大社区报产生至今的历史可分为前媒介融合时代和媒介融合时代两个阶段。在前媒介融合时代,加拿大社区报产生和迅速发展,有关这一阶段发展情况的研究多是对加拿大历史、加拿大社区报发展历史、史学纲领,或是这一历史时期媒体环境、新闻业的研究成果;在

① 张咏华.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2): 11-16, 94-95.

② 陈凯. 走进美国社区报[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③ 曾兴. 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52.



媒介融合时代,加拿大社区报开始超本地化(hyper-localization)转型,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多由行业协会或者关注社区报发展的业内机构组织开展。

有关前媒介融合时代加拿大社区报的研究大致可区分为以下四类。

首先,有关加拿大历史、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为本研究提供整体的背景知识。以《剑桥加拿大史》为例,该书对加拿大的历史进行了完整、细致的梳理,其内容不仅包括加拿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也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加拿大经济情况的发展、文化习俗的生成和演变^①,对于本书了解社区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重要的参考。另外,对于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如王建娥的论文《多民族国家建构认同的制度模式分析——以加拿大为例》,对加拿大联邦-省议会制度的内涵及其生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②,对于本书了解加拿大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其次,有关加拿大报业发展历史的研究对于本书梳理加拿大社区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科斯特顿(Kesterton)所著的《加拿大新闻史》(*A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anada*)^③是加拿大新闻史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尽管该书出版较早,但仍能为本书了解社区报产生前后加拿大的媒体环境提供参考。另外,在线版的加拿大百科全书^④是《加拿大百科全书》的网络版本,它沿袭了《加拿大百科全书》对于词条作者和稿件严格的选择和审稿程序,在线版加拿大百科全书的严谨性令人称道。在加拿大报业发展史方面,在线版加拿大百科全书提供了丰富的词条检索,且其内容十分详尽,对本书有较强的参考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对于加拿大社区报的发展也投注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国内掀起社区媒体的研究热潮,其中很多学术研究均对加拿大社区报的历史、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具

① 康拉德. 剑桥加拿大史[M]. 王士宇,林星宇,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9.

② 王建娥. 多民族国家建构认同的制度模式分析——以加拿大为例[J]. 民族研究,2013(2): 1-13.

③ KESTERTON W H. A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anada[M]. Sherbrooke: McGill-Queen's Press-MQUP,1967.

④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EB/OL].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

体的研究成果如曾兴所著《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①，周敏所著《中国城市社区媒体研究》^②，均开辟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加拿大社区报的发展情况。

再次，媒介环境学派对作为历史背景的媒介的考察可对本书研究加拿大社区报的超本地化转型有所启发。正如《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一书所秉持的观点，将媒介环境学视为“传播学的第三学派”实则曲解了这一研究范式的本意，相比一个传播学观点的集合，媒介环境学其实更应被视为一种历史纲领。“作为纲领的媒介史则不仅仅会从文化史、社会史或观念史等各种编史角度出发，把媒介作为一个专题来讲述，还要反过来，从媒介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一般的文化史、社会史或观念史”。^③也就是说，作为历史纲领的媒介环境学并不将媒介视为历史的焦点，而是将之视为历史的环境或背景。这一视角为本书理解加拿大社区报超本地化转型中对于地方信息的倚重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如同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哈罗德·伊尼斯的观点，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④，这可对本书思考网络以及依托网络技术产生的超本地化新闻的偏向性有所启发。

最后，有关新闻生产规律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作为本书研究加拿大社区报超本地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一定会论及加拿大媒体或者社区报这种媒体形式，但却可通过对新闻生产、传播规律的细致分析而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迈克尔·舒登森(Michael Schudson)的《探索新闻》对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两种信息传播模式的阐述。^⑤或如约翰·H. 麦克马那斯(John H. McManus)的著作《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该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地方媒体的考察，归纳总结出市场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模式，并对市场新闻业和规范新闻业两种新闻生产逻辑的博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本书不仅可为本书了解北美地方媒体的新闻生产

① 曾兴. 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② 周敏. 中国城市社区媒体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③ 胡翌霖. 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74.

④ 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

⑤ 舒登森. 探索新闻[M]. 何颖怡，译.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



方式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其所采用的方法论也对本书研究方法的设计有所助益。

对媒体融合时代背景下加拿大社区报的研究在 2015 年前后逐渐出现,其中泰勒·纳格尔(Tyler Nagel)发表于 2015 年的文章《加拿大社区报上的线上新闻:现状与建议》较早开始关注到社区报与互联网进行融合的趋势,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文章认为,尽管此前社区报一直呈现出较日报等更加乐观的发展形势,但加拿大乡村地区新近出现的高本地化的网站(rural-focused hyper local websites)和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使得社区报在乡村地区的发展面临挑战。为此,很多社区报开始运营网页版,该文通过对加拿大各地的 776 位社区报管理者进行访问,总结了关于加拿大社区报网络新闻分发和网站管理的多种方式。不过,通过一系列的访谈,文章发现当时加拿大社区报媒体机构更注重其纸质版的发展,而相对不够重视社区报网站的运营,文章认为这与社区报网站尚未取得良好的广告收益有关。^①

另外,在学者针对加拿大社区报所做的专门研究之外,业界也有一些机构组织对加拿大社区报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情况予以关注。如前述加拿大新闻媒体(News Media Canada)每年都对加拿大社区报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和分析,并推出当年的加拿大社区报发展情况简报和数据表,这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另外,PrintAction 等媒体分析机构也会对加拿大社区报的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其针对个别社区报案例所做的深入采访也可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参考。

四、有关媒介融合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媒介化方法的研究

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基层治理的媒介化方法的研究是前述对媒介融合、基层治理和媒介化方法三类研究的交叠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潘忠党对电视问

^① NAGEL T. Online news at Canadian community newspapers: a snapshot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J]. Journal of applied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2015, 4(2): 329-362.

政这一媒介化治理方法的讨论、郑亮对县级融媒体所具有的治理功能的讨论、葛明驷对县级融媒体的舆论治理功能的讨论,以及熊茵和刘丹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治理功能和媒介化实现路径的探讨是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对本书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通观前辈学人的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它们大多针对的是县级融媒体或某种特定媒介(或电视节目)形式的单独分析,且多呈现为期刊文章的形式,在探索的深度上相对受限。可以说,总体来看学界在这一领域兼具深度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为本书留出了一定的探索空间。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各章概要

在“案例研究—功能探析—路径探索”的研究框架下,本书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开展研究,并依据这一研究框架进行各个章节的内容安排。本节将分别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本书的创新点与难点,本书的研究意义及各章内容概要。

一、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和基于扎根理论的反复比较法两种。

(一)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一种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即案例的实证研究方法,其通常适用于对以下情况的分析。

- (1) 研究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
- (2) 研究的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3) 研究者对于案例难以进行控制或者只能施加极有限程度的控制。^①

本书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基层治理媒介化方法的功能探析路径探索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和实践的再思考的基础上的,其中,第三章主要是对相关实践的总结和阐述,这一章分别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中国的城市商业社区媒体实践以及加拿大社区报的超本地化实践三个案例。从案例分析法对本书的适用性来看,首先,对三个案例实践历史、特点和经验的研究均属于“怎么样”的研究维度;其次,这三个案例均为目前正在发生的实践;最后,由于三个案例均属于大规模的社会实践,笔者难以对其进行控制和参与,但却很适宜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其进行详细而客观的分析。

(二) 基于扎根理论的反复比较法

在具体的案例分析过程中,本书参考了由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所推崇的基于扎根理论的反复比较法。这种方法倡导在占有大量经验材料(如档案资料、新闻报道、访谈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不设立场的从下至上的分析,对于本书已经占有案例媒体大量报道材料的情况较为适用。因此,在本书的第三章中,以这一方法对中国城市社区报和加拿大社区报的大量新闻报道、网站设计、相关学术文章等材料进行了反复比较的分析,通过不断编码至理论饱和的过程探索出了中国和加拿大社区报的报道特点、核心关怀等。

二、本书的创新点与难点

近年来,伴随着肇始于西方国家政治学研究界的“治理转向”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落地生根,以及国内行政、政策话语中对治理的目的、原则、方法等的强调,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开始从各自的学科立足点出发去思考基层社会的治理议题。本书即产生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力

^① 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周海涛,史少杰,译.5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9.

图从传播学的学科视野出发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阐释和可行的媒介化治理方案。

具体而言,本书的创新点和难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创新点

(1) 本书以媒介化方法为切入点思考基层治理的学理逻辑和实践路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从传播学视角对基层治理进行了思考,但是,这些研究通常聚焦于具体的媒体实践,而相对欠缺结合媒介环境和文化差异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因而使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 本书在对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研究中引入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社会学分析路径,不仅重新发现了人类生态学方法在当前基层治理领域的应用潜能,丰富了对城乡基层社会的思考维度,而且在人类生态学的路径指引下提出了以区别化的理念开展城乡社区的媒介化治理,这一思考角度和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 难点

(1)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是以小见大的研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国内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关基层治理的成果早已数不胜数,这些研究因为不同的原因相连,共同组成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系统。在这一个卷帙浩繁的系统中,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以小见大地窥见基层治理这个多学科学者给予关注并不断提交更新理论成果的议题的全貌,梳理出一条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脉络,是一件极其考验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知识储备的事情。本书即面临这样的处境,需要以传播学研究为立足点,统筹兼顾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是本书面临的挑战之一。

(2) 由于本书所采用的三个研究案例均具有覆盖面广、开展时间久、内容丰富的特点,因此,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时需要收集体量颇大、内容庞杂的研究资料,如何在有限时间里完成这一资料收集工作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排序是本书的第二个难点。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

本书的学理价值主要在于从问题视角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从基层治理的视角切入地方媒体的融合改革,思考了如何接合媒介融合与社会治理等研究议题,并深入探索了媒介化手段之所以能助力基层治理的学理逻辑,以“社会皮肤”“公共礼物”“稳压器”和“情感纽带”四个隐喻详细探索了媒介在基层治理中所具有的功能。

本书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引入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社会学方法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指引媒介化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提出了以区别化的理念开展城乡社区的媒介化治理,这一思路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对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考维度,同时对企事业单位、组织机构、基层部队等运用媒介化手段开展治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四、各章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导论”“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产生”“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典型案例”“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功能探析”“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路径探索”五章。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是对全文的基本介绍,包括:对本书选题思路的介绍、主要概念的界定、前人文献的梳理,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各章内容的总体介绍等。

第二章“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产生”是本研究主体内容的开篇,对全文的研究起着重要的逻辑铺垫作用,包括对基层治理情况的历史和当前内容的阐述、对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的分析,以及对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分析等。

第三章“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典型案例”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包括对国内外媒介化基层治理经验的总体介绍,以及对中国县级融媒体实践、中

国城市社区报实践,以及加拿大社区报的超本地化转型发展实践经验的详细阐述和分析。

第四章“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功能探析”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二,这一章的写作目的是对媒介化的基层治理为什么能发挥作用的深入分析。这一章将媒介化方法对基层治理所具有的功能概括为社会皮肤、公共礼物、稳压器和情感纽带四个隐喻,并深入分析了媒介化方法对于基层治理所发挥的舆论引导、公共服务、风险防控和社会整合等功能。

第五章“媒介化基层治理方法的路径探索”是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这一章本书将对我国应如何开展媒介化的基层治理进行详细的讨论。具体而言,本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探讨了媒介化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提出应该基于人类生态学、跨文化分析等理论路径建构一体化的差别化基层媒介化社会治理框架,以一体化为宗旨和远景目标,以差别化为方法和现实选择,构建城乡有别的媒介化基层治理格局,并且提出应从县级媒体融合、社区融媒体建设,以及基层媒体的评价和监管方式革新等方面制订具体化媒介治理方案的建议。